

鼓励我们多读书

1981年7月,我从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毕业后,分配到上海市委招待处下属的西郊宾馆做接待服务工作。那时西郊宾馆还没有对外开放,我工作的“怪楼”(即原先的淮阴路200号,现称4号楼,俗称“怪楼”,因紫竹环绕,故又称紫竹楼)虽有几间客房,但来住的人很少,市委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个美丽而特殊的客厅、会议室和首长休息室,有时也在这里宴请地位较特殊的客人。我是这栋楼的管理员,因此接触各级首长的机会比较多。

1981年10月18日傍晚时分,我正准备下班,忽然接到宾馆总经理老孙的电话,说等一会儿有领导来参观。不一会儿,一位身材精瘦、个子不高、披着军大衣的老人健步走在弯曲小道上,只有一位随行陪同。我一眼就认出,这位老人就是胡乔木同志。

胡乔木看得很仔细,先站在外面看玻璃天棚,然后走到客厅,巡视四周。走到2楼,他看到正面壁炉上有一幅油画,就站下来仔细看了看。这幅画我们平时根本不在意,觉得这只是一幅平常的风景画,这么多来参观的人也没人问起。胡乔木却很感兴趣,他伫立在油画旁,告诉我们,这是一幅俄罗斯的油画,又随口讲解了俄罗斯油画的几个代表人物。由此引发开去,他又说起了俄罗斯文学,讲的重点是19世纪文学,我至今记得他当时讲到的有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……他对文学艺术如此懂行,让我们很吃惊,也很佩服。

我们又走到主卧,卧室里有又长又大的衣橱,有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樱桃木家具;盥洗室中不仅有坐厕,还有在那个年代非常先进的冲淋设备。胡乔木只是看了看,对这些高档的物质设施却不是很感兴趣。

走出卧房,他问我这栋楼的来历。我只知道是原来南京水泥厂老板姚乃炽的度假别墅,其他就说不上什么了。他若有所思地说要多了解一些,又鼓励我们年轻人要多读书,读些历史、文学方面的书籍,对以后工作有益处。

离开时天已渐黑,胡乔木听到动静,回头看见门口年轻的员工在上树采桔子,他笑了笑,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宽厚温暖的笑。或许是想起了他年轻时爬树调皮的情景,又或许是在延安杨家岭看到小孩爬树摘枣子时的场景……我突然觉得,这是一位多么和蔼可亲的学者老人啊!

胡乔木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话不多,但学问多,似乎什么都知道。这真是一位大知识分子。老干部深厚的文化底蕴,对文化生活、精神生活的重视,令人印象深刻。

深入基层辟思路

1981年12月25日上午,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(曾任外贸部长)来参观。

方毅同志非常细心、务实,他一边参观,一边询问,这栋房子原先的主人是谁,在建筑上有什么特殊意义,对外开放不开放,价钱是多少,还问到我们宾馆的基本情况和经营情况。我一一作了回答。谈到宾馆的就餐标准,比较高的标准是每餐人均50元人民币时,方毅说:“不能拿我们在国内的眼光来看问题呵,既然对外开放,就要有世界性的眼光。这里环境这么好,地方这么大,收费规格要高一点嘛!你们把餐费提高到100元、200元,绝对没有问题。”他还指示我们研究一下国际大都市同类型的宾馆,把价格以及整个管理工作提上去。

听了这番话,我的脑子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。当时普通员工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50元左右,以我们的眼界,很难想象还能“涨价”。那时才刚刚改革开放,信息不畅通,国外的情况不了解。方毅同志的指示,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。

在谈到接待对象时,方毅说,这样的宾馆条件完全可以接待各国的国家元首,还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外国人怎样做生意的情况。那时国家外汇很紧张,要引进国外的新技术,很多地方都得用外汇,他告诉我们:“要努力赚取外汇,来为我们的‘四化’建设服务。”

方毅同志走后,老孙把指示向上级领导汇报了,领导研究后,随即上调了服务收费价格。1982年6月8日至10日,香港船王包玉刚来我们宾馆下榻。本着与国际接轨的原则,我们收取了每天1500元的房价;宴会按每人100元的标准,共收取了三万元。而1981年西郊宾馆全年的餐饮营业收入只有16万。

有了这样的经验,我们渐渐体会到方毅同志讲的道理,的确是有世界性眼光的。心中有了谱,思路就更清楚了。后来西郊宾馆也从吃国家财政拨款,逐步跃为年利润几千万元的创汇大户。这些经验的积累和推广,大大促进了上海整个旅游业的发展。

这一切,还得感谢方毅同志来到基层,为我们“指点迷津”。

紫竹楼见证好作风

◆ 邱根发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西郊宾馆工作,接待过胡乔木、方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,有幸亲耳聆听他们的教诲。他们有理想有学问、平易近人、关心群众冷暖的好作风、好传统深深感染着我和我的同事们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眼前。在现在大力倡导传承“好作风、好家风”的时代,我记录下当时的场景,希望能为当下提供一份宝贵的历史档案。



■ 紫竹楼外景(摄于上世纪80年代)

“后继有人”畅胸怀

原华东局书记、中央政法委副书记、司法部长魏文伯同志小中风后身体欠佳,来上海治疗和休养,常在马秘书的陪同下来散步休息。他个子高大,戴着眼镜,穿着朴素,常常是一身旧的灰布中山装,脚上一双黑布鞋。

接触几次之后,魏老对我熟悉了,跟我攀谈的内容也多了起来。除了问一些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琐事,他还问我平时读什么书。我把我喜欢读的书向他一一汇报。他对我说,一定要读哲学,无论干什么工作,都要读哲学,要读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和《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?》,还要读历史。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开了一个简单的书单:鲁迅、巴金、茅盾、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等。

百姓冷暖挂心头

1982年7月4日,时任上海市市长书记汪道涵来西郊园小憩。

汪道涵在室内花园坐定后,就讲起了他刚才在武康路上看到的市场情况,接着就问起我们市场供应状况如何?蔬菜是否买得到?猪肉削价后买的人多吗?他偶尔说说上海话,让我们觉得很亲切。

汪道涵问我对上海的感受,我说:“上海变化不小,就是住房困难。现在青年人结婚没有房子,只能到附近借房子,市区没有,只有到郊区。”他听后说:“这是个问题,要尽力解决。”沉思片刻,他说:“住房困难是长期积累下的问题,当然也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,我们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。”他显得有点沉重起来了。

我说:“是否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,等房结婚的青年人,由单位借1000元左右,5年或10年偿还,房建成后,优先考虑,当然也要付房租。”

汪道涵点点头,夫人孙老师也在在一旁说:“目前分房政策不公,是否可以造一批房子卖给私人,也收房租,不过房租可以低些。”

老革命心系民众

在“怪楼”工作期间,我曾多次接待过江渭清同志。他那时刚从江西省委书记的位置退下来,住在吴兴路上的一幢普通公房里,后又搬到淮海西路一个居民楼的三层。他的生活质朴、平常,很少麻烦人,平时起居都是自己打理,请阿姨烧烧饭。

那时江渭清常来与魏文伯等老同志小憩聊天。我在日记上记得比较详细的是1981年10月14日的事。那天上午9点,江渭清穿着淡灰色制服,戴着口罩。他叫我坐在他旁边,聊了起来。当他听到服务员小颜晚上要值班很害怕时,他笑了起来,一边用电动刀刮胡子,一边说起他21岁时,当时任营教导员,在一次掩护同伴撤退时自己腿上中了一枪,倒在死尸中,脸上都是血,在国民党兵来搜查时,他与死尸睡在一起,佯装已经死了,渡过了难关。

讲到作风方面,他说,要学点本事,要有真才实学,不要做口头革命派,要言行一致,还要有闯劲,“人一定要闯,我们年轻时,就是闯出来的,我们党许多前辈革命家,都是很年轻就担任了重要工作的。”

1982年五月初的一天上午,魏老再次来到紫竹楼。他诗兴勃发,叫我拿纸笔来,要写一首诗送给我。我赶紧把纸笔递给他,他挥笔即书:滴滴潺声细水流,竹桥过渡东西游。四周花朵畸相立,后继有人不用愁。魏老指着诗解释道:“前三句是写景的,最后一句是抒情。第三句有过渡的意思,既是写景,也带有一些抒情,‘四周花朵’可以理解为双重含意。”经他点拨,我明白了,“花朵”是写实,也是比喻,“后

继有人”是实指。我问:“是不是指革命事业后继有人?”魏老点了点头,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说道:“今年中央精简人员,老的退下来,换年轻的上去。不少人对年轻的接班人不放心,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,所以说:‘后继有人不用愁’。”

过了几天,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任免国务院和部委新的领导人名单见报了。这天上午,魏老又到花园来了。他依旧穿着那身衣服,不同的是刚修过脸,显得比往日更有精神,刚坐下就对我说:“我离开了司法部长的岗位,你知道吗?”脸上带着笑意,神情非常轻松,好像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使命似的。我点点头,告诉他早晨从广播里听到了。

“后继有人不用愁”,老一辈领导干部的胸怀令人敬佩!

只要两杯白开水

80年代初,王一平经常来西郊宾馆小憩。他平时话不多,感觉比较严肃。一次,他和夫人张梅修一起来。那时我们有一个小酒吧,专门为外宾开设,有时还宴请客人饭后小酌。酒吧设在一至二楼梯道上,平时一般关门。他们走上前看看,问平时客人点的洋酒名称、价格以及一瓶散卖大概可以卖多少杯?我回答说“黑方”、“红方”点的比较多,一般一小杯是3元,一瓶Gin酒可以卖十几杯。他听了很有兴趣。

酒吧旁有一个冰柜,里面放着听装的可乐、雪碧。当时刚刚改革开放,市面上可乐雪碧不多见,甚至可以算得上是“高级货”,一般人都会挡不住诱惑想尝尝鲜。他们也许也觉得新鲜,所以停在冰柜前注视。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也会想要喝,便准备开给他们喝,却发现他们连连摆手。于是我又拿起一瓶他们山东家乡出产的崂山矿泉水请他们饮用,他们也婉拒了。最后,他们只是要了两杯再普通不过的白开水,便在楼下沙发坐了下来。以后他们每次来,也只是喝白开水。

这对老夫妇坐在沙发上,悠闲地喝着白开水,口中讲着山东话。他们那相濡以沫、宁静致远的气质,真是一幅很美的画!真是可惜,那时没有照相机把这一幕拍下来,但它已经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王一平夫人平时就极为朴素,齐耳短发,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两用衫,很重的山东口音,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又和气又可爱的邻家大妈。第一次见面,我根本想不到这位高干老人的夫人,也是一位老革命。后来才了解到,张梅修1938年参加革命,“文革”前已是正处级干部。但由于王一平对家人的严格要求,张梅修一直到离休前都是正处级。更为难得的是,王一平虽然长期分管干部工作,但他却从不让子女们走“仕途”。

这是多么可贵的品格啊!对个人来说,是严于律己;对其他领导干部来说,是清正廉洁。我后来在丁香花园工作,常听一些老同志说,当时像王一平这样“过分”要求家人的领导干部有很多,上行下效,蔚然成风,所以,干部威信都很高。

我想,这批无私为民,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老党员、老革命们,正是今天提倡好作风、好家风,值得好好珍视的宝贵资源!